

亚洲探險之旅

● 新疆人民出版社

荒原的召喚

〔俄〕 普尔热瓦斯基著 王嘎 张友华译



亚洲探险之旅

●〔俄〕普尔热瓦尔斯基著 王嘎 张友华译

荒原的召唤

新疆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荒原的召唤/(俄)普尔热瓦斯基著;王嘎,张友华译. —乌鲁木齐: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4

ISBN 7-228-05664-7

I. 荒… II. ①普…②王…③张… III. ①自然科学-考察-中亚②游记-中亚 IV. N8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03314 号

出 版 新疆人民出版社
地 址 乌鲁木齐市解放南路 348 号
邮 编 830001
印 刷 新疆金版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新疆人民出版社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1.5
字 数 270 千字
插 页 2
版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 000
定 价 18.80 元

总序 李榕

公元 1486 年，一个名叫巴托罗缪·狄亚斯的葡萄牙人乘船第一次航行到今天的非洲南端。他把他登上陆地的地方叫做“暴风角”。回去后，他向国王汇报，国王说：“不，你发现的不是‘暴风角’，而是‘好望角’。”1492 年 10 月，一位名叫哥伦布的意大利航海家想从地球上找到富饶的中国、印度，但他的航船却意外地撞到了今天的美洲大陆。1519 年，费尔南多·麦哲伦从今天的西班牙横渡大西洋，第一次完成了人类历史上的环球航行，探寻到一条从欧洲到美洲，从美洲到亚洲和非洲的交通线路。于是，这些人便被认定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探险家。历史学家把哥伦布看作是“新大陆的发现者”，把麦哲伦称作“最伟大的航海家”。虽然，麦哲伦最终以他的暴行被菲律宾人杀死了。

人类社会之所以进步、发展、提高，重要原因是人类总在进行着永无止境的各项探索。狄亚斯、哥伦布、麦哲伦所进行的也是一种探索。这种行为就是走前人从未走

过的道路，冒着九死一生的危险去探寻目标。因为这种行为总伴随着自然或人为的危险，所以，人们又把这种行为称之为“探险”，把从事这类活动的人称之为“探险家”。

纵览人类的探险史，我们会从中发现探险家的目的、动机甚至机遇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如果我们摒除探险家各自的目的和政治动机，单纯从他们的成果和记录下来的知识而言，我们就会相信，探险对人类社会的进步是有益的。哥伦布、麦哲伦这些人的探险活动，其结果是促进了各大洲之间交通的发展，加速了世界各大洲之间的互相认识 and 了解。

世界认识亚洲、亚洲认识世界，同样首先是通过一批有勇敢精神的人们的探险活动而实现的。特别是世界对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的认识和了解、亚洲最大的国家中国对世界的认识和了解，所历途径，都是一样。第一个来中国，并且把中国文明介绍给欧洲的人是意大利人马可·波罗，那时是中国的元朝。而在这之前，中国晋朝的大僧人法显已经从陆上沿着“丝绸之路”，走到了印度各地及今天的斯里兰卡，又由斯里兰卡从海洋上漂到今天的山东半岛。他的动机是取经和参佛，但他身上所具备的却是探险精神。公元7世纪，我国唐朝的、至现在还被世界津津乐道的大僧人、大法师玄奘又沿着前人的足迹，踏上所谓的“死亡之海”、“高原禁区”，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千难万险地从长安走到印度半岛的最南端，历经十三年，然后又回到唐太宗李世民治理下的中国长安。中国

的旅行家、探险家的著作，给中国提供了认识外界的知识，甚至还给印度人认识他们自己的历史提供了连他们本国也没有记载下来的实录。请看，事物的因果关系岂不是十分明白吗。

人类依靠自然的生存环境而生存、繁衍。一个群体，最初形成在一个环境优越的地方，他们是一个国家，或者是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他们被海洋或者高山、大川隔绝，外界想触探他们那儿，就要探险；同样，他们要了解外部世界，也要探险。在科学技术发达的今天，人们从电视上就可以看到在法国举行的'98世界杯足球赛现场直播，与法国人共同欣赏足球明星漂亮的射门。但在人类还没有走到这一步的那些年代，不通过探险是绝对了解不到另一个天地的真正面目的。大至一洲与另一洲，小至一国家与另一国家；此一地到彼一地，此一族到彼一族，应该说都是这样的。探险家的实地访问记就是那个时代的“现场直播”！到亚洲大陆各地进行过探险，并且写下探险记录的那些人的著作，也是被考察地区地理和人文景观的“现场直播”。

19世纪的下半叶和20世纪的上半叶，特别是20世纪的头二三十年里，是亚洲探险的又一个高峰期。在探险者之中，论洲别有欧洲人、美洲人和亚洲人；论国别则有英国人、普鲁士人、瑞典人、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匈牙利人以及日本人等；论探险者们所从事的专业，则有考古学家、登山家、动植物学家、人类学家、宗教僧侣、地理

学家以及记者、旅游者等等。他们的足迹所至，东起库页岛，西到伊朗，北到西伯利亚的南部各地，南至缅甸、印度北部。我国的蒙古高原、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准噶尔盆地以及云贵高原无不成为他们探险的目标。这些地方的名山大川、荒漠戈壁、少数民族聚居区、古代城镇遗址无不印下那些外国人的足迹。其中，以“丝绸之路”命名的古代欧亚大陆桥沿线各地更是探险家们竞相追逐的热点地区。通过这些人的探险和发掘，一批高山被征服了；一些被称之为“生命的禁区”的地方被他们越过了；哈拉浩特、高昌、交河、楼兰、尼雅等一批古代城镇或烽燧遗址被他们挖了又挖，掘了又掘；敦煌莫高窟、拜城的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的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库车的库木吐拉千佛洞等佛教艺术洞窟被他们考察了个遍。成千上万的文物被发现或挖掘出来。他们之中的一些人一举成名，一鸣惊人，成了当时轰动世界的人物；有的人被本国、第二国甚至第三国聘为院士之类的专业职务，甚至为他铸造了纯金像。主要原因，说简单一点就是此人探了“险”，得到了他们国家官方或私人无法得到的知识。

从事物的本质上看，亚洲当然是亚洲人的亚洲，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亚洲的社会进步是亚洲人应当做的事情，中国的发展也只能由中国人推动。今天的亚洲已经不是八九十年前甚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亚洲，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朝或北洋军阀那个时代的中国。但是，今天的亚洲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今天的中国包括中国的各

个边疆地区也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那个时代的亚洲是个什么样子？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的边远地区是什么样子？这就不能以今天的繁荣去推测了。比如拿丝绸之路重要路段的塔里木盆地而言吧，今天的塔里木盆地四周城镇林立，绿洲连片，有高等级的公路和方便的食宿。那么，当年呢？当年是否也是这样的繁荣和发达呢？对此，今天的我们无论是谁也不可能用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那么，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呢？办法只有一个，去阅读研究专著和探险家的见闻吧。而学术专著并非普通人能读到或读得懂，而探险著作就不同了，它大都是见闻、历程的直接记录，好读、有趣、易懂。对于学术界人士不可或缺，对于普通求知者也不是天书。

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来亚洲探险的探险家们，大多数人都有大块大块的文章，一大部一大部的著作。他们的著作记的都是他们亲身经历和亲见亲闻的事物。从回首过去、增长知识的角度来说，这些著作都是难得的资料。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著作翻译成中文者为数极少，我们所见者仅系风毛麟角。为了让我们的读者能够知道昨天亚洲各地区，特别是让读者能够广泛地知道昨天的我国各个角落的社会状况和地理景观，我们决定组织一定人力，投入一定财力，把一些比较好的亚洲探险著作译成中文，奉献给广大读者。

亚洲探险的著作很多，语种各别，优劣不一。我们所选者皆是那些严肃认真的，知识性、科学性较高的。总

之,我们并不是白菜、萝卜一把抓,而是尽量选择其中的最精彩者。当然,我们也知道,有些探险者的看法和我们并不相同,或者不完全相同,我们认为这无关宏旨。我们现在不也是经常要听一听外国人是怎样看我们的,那么,我们听一听昨天的外国人对昨天的我们说些什么,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我相信,这样看待问题,我们的读者和我们是一定能够取得共识的。

在伊塞克湖滨陡峻的崖岸边，每年都有一些游客驻足于一块凸起的山岩状的纪念碑前，但见岩顶是一只用青铜铸出的嘴衔橄榄枝、爪踩亚洲地图、目光阴鸷的鹰鹫；岩中间镶着一枚放大的皇家科学院铸造的青铜奖章，支撑奖章的岩座上刻着奖章背面的题词：“奖给亚洲中部大自然的第一位考察家”。一百多年过去了，纪念碑上铜绿斑斑，偶有寒鸦倏忽而过，之后便是长时间的夙寂。逝去了一个世纪的人，远离褒贬，只将一片片依然料峭的荒原留在每一个寻常之日。

1839年，在俄国斯摩棱斯克省金鲍罗沃村一位退役陆军中尉的家中，一个刚出世男婴那响亮的啼哭声，给这家人带来了欢乐，刚刚分娩的母亲疲惫地看着这个小家伙说：愿这个孩子自由、快乐。这个孩子就是尼古拉·米哈依洛维奇·普尔热瓦尔斯基。的确，这是一个酷爱自由的孩子。在这个孩子还不到七岁时，其父就去世了，他经常跟着舅舅到野外打猎，一去就是一整天。他受的教育完全是斯巴达式的，“我简直成了一个野人”，他后来回忆时说。这种生活养成了他刚强的性格，独立思考的习惯及罕见的记忆力。

一本书可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对普尔热瓦尔斯基来说，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有一次，年轻的普氏偶尔在学校图书室里发

现了一本《无畏的战士》，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起来，书里的内容给他留下的印象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认为只有仿照书中所描述的主人公的路子走，才能成为一位勇敢、自由的战士。于是，他下定决心去服兵役，然而真正成了军人后他才发现，行伍生活是这般的残酷、乏味，体味书中描绘的美好幻想很快化作泡影，他心情悒郁、局促不宁，他变得孤独、沉默，不愿加入那些军士无聊的酗酒，也不愿同他们一起玩乐戏耍，只要一有时间，他就抱着动物学、植物学书籍阅读。这一来，他心底升起一股强烈的愿望：“一定要去旅行，那才是我的生命之所在！”

命运的大门果然又一次向他敞开。1861年，在一次军事院校的招考中，普氏被录取了。在这所学院里，他学了测量学、自然科学等科目，而对军事科目则是应付一下了事。余暇，他写了一篇《猎人的日记》投寄杂志被采用，愈发激起了他那向往遥远未知国度的念头，“能沿着贝克尔的足迹，去发现白尼罗河的河源，那该多好啊！”是的，能踏上探险的旅途，于他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一种理念，而在于一种生存的价值。这个念头长期困扰着他，他饥渴般地研习着相关的学科，洪堡的《自然景色》、李特尔的《亚细亚》等皆成了他案头参考书。他越来越厌恶都市繁华的灯火、咄咄逼人的车流、花枝招展的上流社会、散发着各种气味的市井生活。他说：“人群较之大自然的任何灾难更可怕，更具有毁灭性！”他下定决心到一个欧洲人至今还没有踏上足迹的地方！

1864年12月普氏25岁，他被华沙军官学校任命为学校的排级教官和地理教员，站在讲台上，他甚至告诉学生：“我不大相信文明的益处，它不过是给生活这个其苦无比的药丸裹上一层糖衣而已。”他不断地表明自己的生活态度：“荒凉、辽阔、自由……我无限地热爱啊！”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他与西方那些为好奇心、野心、使命感及信仰驱使的探险家、传教士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

1867年5月，普氏被派到乌苏里边区进行纯军事目的的考

察,时值中国政府被迫与俄订立《璦琿条约》的第九个年头,对他而言,这次考察又是一个契机,也是他在探险生涯中迈出的第一步。他的任务具体而明晰:视察被占去原中国东北六十多万平方公里土地的边防部署,搜集满洲人和朝鲜人居民点情报,探清通往满洲的道路,修正军事路线图等。他乘着轮船从乌苏里江驶过,这时,“一大群满洲野人赤身露体地跑到河岸边,惊奇地看着我们”,他乜斜着眼睛,唇边挂着讥诮的笑意,充溢于他心胸的“文明人”的优越感,使他居高临下地俯视着当地土著,仅从他这不经意的目光中,我们便可读出他对文明的诠释。这次考察归来后他写了《滨海省南部异族居民》一文,被皇家地理学会授予第一枚小银质奖章,这为他今后的探险做了较好的铺垫。这时,探险计划已日趋成熟,他急欲呼吸旷野上纯净的空气,享用荒原那无与伦比的自由,拥怀蓊郁的丛林,倾听鸟儿啁啾和鸣的天籁之声。

他开始做旅行前的准备,包括向俄国陆军总参谋部提交考察的书面计划,向皇家地理学会提出申请,四下筹集经费。他一再陈述自己的观点:“我们决不能把这些考察工作让与他人,也不能让别人在亚洲这个地区的考察超过我们。”他的想法与沙俄军政机构殖民扩张的考虑一拍即合,基于此,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提请俄国陆军大臣协助普氏实现其拟定的旅行计划。

1870年11月,普氏终于踏上了他翘盼已久的探险考察之路,他带着武器和各式猎枪说:“在亚洲,我手持步枪,比在俄国的城市里更有保障。”他选择的路线是从俄国边界上的军事重镇恰克图出发,经库伦(今外蒙乌兰巴托),穿过蒙古荒原至张家口,抵北京,而后再在早春时节由北京出发,横穿内蒙南部,再去青海。

荒野之路四通八达,世界无限展开,单调乏味的平缓小丘与远处的垆岗颠连一气,天空唐突地向地平线包抄去,偶尔闪过黄羊矫捷的身影,无所事事的太阳又西沉了,考察队的一天也这样结束。这样的行进不由得人会索然寡味,惟一让普氏提起兴致干的就是

观察荒原的动植物区系，并对它们的生境加以记录。

张家口到了，普氏以轻蔑的口吻描述道：“男人们拖在脑后的长辫子，还有那怪腔怪调不可理喻的陌生语言。”在这里，他见到了举世闻名的长城，不管怎样，长城给他以强烈的震撼，他在给他母亲的信中这样写道：“那条穿越整个北美洲大陆的铁路，在这个庞然大物面前至多也不过是个玩具而已。”同时，他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这个人工物障又怎能阻挡外族的入侵，这巨大的城墙无非是留给后代的一个教训而已。

普氏进入了北京城，马上发现他们这四个欧洲人正置身于极端仇视他们的人中间，“我还很少了解这座城市，但是，初步的印象就足以肯定这是一座污秽不堪的城市……”“中国人的粗鲁无礼着实令人生厌。他们把欧洲人一律蔑称为‘洋鬼子’，在这一称呼中还时常夹杂着各种难听的脏话，可以想像，当你置身于这座都城的街头时，你的心境会有多么地‘愉悦’。”因而，普氏认为：“这里的中国人是犹太人加莫斯科的骗子手，一对双料货。”然而，普氏却没想到，仅仅就在十年前，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英法联军直逼北京，咸丰帝带着后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逃往承德，联军在北京城中肆意妄为，奸淫掳掠，火烧圆明园，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沙俄殖民者在其中既充当了英法的帮凶，又趁火打劫逼迫中国政府与他们订立各种不平等条约，《勘分西北界约记》就强占了乌苏里江以东，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大片中国北部领土 84 万平方公里。这一切就像发生在昨天，中国人民没有那么健忘，对这些在自己国家干尽坏事的“洋鬼子”除了仇恨，还能有什么呢？因而普氏在他的考察报告中这样写道：“自从踏入中国大门那一刻起，单凭直觉就能深刻意识到：一个欧洲人来到这个天朝帝国的领土，必将经历一番艰难的苦旅……中国人对外国人的仇恨是如此之深，以至于一路上几乎没有几家旅店肯让我们住宿，且常常不卖给吃的东西。”普氏的遭际正从侧面反映出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罪恶行

径。这样，“沿途的居民简直就把旅行家看成是敌人”也就不足为怪了。普氏从中却提出：“就我的看法，只有欧洲人的枪炮，才能在这里干出一点事业。”

普氏第一次探险，是他在中国进行时间最长的一次探险，共耗去了三年时间（1870～1873年）。由于雇不到向导，又不懂中国话，当地居民不是拒绝给他们指路就是指相反方向，旅行者几乎在每一个路口都要迷失方向，费时费力，白白走上几十公里冤枉路的事情不断发生，普氏恨恨地说：“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找到那个肇事者，就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一顿。”普氏在选择探险路线时，尽量避开人烟稠密的地方，专绕道走那人迹罕至的草滩、沙地、砾漠。在一次进入多伦诺尔附近的沙地时，因迷路，险些葬身沙海，他们翻越一座沙丘，眼前立时又冒出数十座同样大小的沙丘，这群铺展天际的沙丘诡谲地望着他们，而他们携带的水已经告罄，就在普氏几乎要枪毙那可怜的蒙古向导时，绝途中又出现了生的转机；他们在达来诺尔湖岸，还亲眼目睹了一场野火烧天滚地的奇观；他们在强劲的寒风中行猎，捕获到的候鸟是这样的多，以至于一天三顿都吃不完。普氏欲绘制出完好的地形图，他时刻提防着不让当地居民知道他在干什么，他在图纸上标明这样一些内容：考察路线、大小居民点、水泉、湖泊、河流、山脉、丘陵等。终于，普氏来到了鄂尔多斯大草原，第一次看到了九曲连环的黄河。黄河，在任何时代里都是那般的质朴、豪壮、感人，他发现沿河的百姓与这河、与这土地调适融合，了解这条河就像认知母亲一般。普氏到了定远营，这时离青海湖也就只有六百公里的路程了，但迫于资金不足，只好返回北京以准备向他朝夕思慕的目的地青海湖进发。最终，他确实到了那湖，尽管耗时长且历尽周折。在那一刻他看见了端庄安详、通体透明、色彩幻化的青海湖，奇绝的景色联袂而至，高原的风光永不重复！一种满足感饱胀于胸，普氏迎风而立，大声说：“我平生的理想实现了，探险队梦寐以求的目的达到了！”

随后，普氏又率队登上了青海南部高原（他一直误认为是藏北高原），在那里度过了两个半月的时光，猎取了许多欧洲人从未见过的野兽，猎获物多得无法携带，他们便将一部分留在了柴达木盆地。普氏在后来的报告中提到：那是一段多么美好的日子呀，只有在那里，才见不到敌视他们的人；那也是一段艰难困苦的日子，他们历经藏北那难以想像的严寒及各种恐怖的风暴的袭击。然而，那里也留给了他们无尽的遗憾：只要有足够的资金，再往南走就可抵达西藏的首府——拉萨。他相信探险时代的那句名言：“来了，看见了，就征服了。”因而，西藏成了他的一个心病，在他以后的几次考察中，始终没能踏上那片土地，他相信，如果他成功地进入了西藏，并最终抵达拉萨，“那么考察所有亚洲中部那些最神秘地区的荣誉就将属于我了”。

普氏载誉而归，第一次亚洲中部探险，他就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俄国各报刊对他的评价是：“当代最杰出、最勇敢的考察家”、“是深入亚洲大陆完成私人学术考察第一人”等。他四下讲演，要求与他结识的人络绎不绝，他在给自己的亲友写信描述这一切时道出了他烦闷的心情：“得啦，还是谢谢这种生活吧！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也换不去我那宝贵的自由。”他对人们因好奇而提出的种种问题烦极了。他陪同沙俄皇室成员参观了他全部的搜集品，品种之多竟连他自己都暗暗吃惊：上千只鸟类、上百张兽皮、几十种哺乳动物、几百种植物。标本数量大且系统性强。俄皇在参观毕所有展品后，赐他一枚利奥波尔十字勋章。在首都，皇家地理学会亦授予他一枚康斯坦丁诺夫奖章。普氏回国不久，就给俄国总参谋部寄去了一份有关中国现状的报告，紧接着又寄去了第二份报告，专门谈中国西北部东干人暴动的问题。在这部《荒原的召唤》中，可看出普氏自觉承担起沙俄扩张的使命，时时刻刻搜集沙俄感兴趣的情报，因而他极其关注清朝政局状况。我们知道他眼中的东干人暴动虽一定程度地反映了客观历史，但考虑到普氏的立场、观

点及他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在我们回顾那段历史时，就应正确地对待他的材料，公正地评价清末回民暴动的历史事实。普氏在日记中忘情地写道：

风暴，迎风暴而上，
经片刻的小憩，
航海者又要出发！
命中注定，
我永不可能幽居在恬静的乐园。

就这样，他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他又三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次比一次娴熟，一次比一次更深入，一次比一次更大胆，以至于在第四次探险时，在黄河源头，一次就枪杀藏民三十余人，首开一个外国人在中国领土上肆无忌惮、横冲直撞的恶劣的先例，但他却总结出这样的经验：“高超的射击本领，就是最好的中国护照。”普氏崇尚武力，在一次探险途中，考察队突然与两个蒙古人相遇，普氏要求这两人给他们当向导，两人不愿意，普氏马上就亮出了他们的王牌——枪，逼迫他们随行，并警告，如若逃跑，马上就开枪。普氏形象地把自己比做可以刺伤大野兽的刺猬，他这只“刺猬”竖起满身的刺，走到哪儿刺到哪儿，致使他们本国都有人认为他在亚洲中部有不少越轨的行为。他带着“文明人”的有色眼镜，不止一次地对所到之处的、世代居住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表现出一种狂妄的民族自大情绪，轻蔑地视当地人为“心智不全者”。试想，持有这种态度的人，对那些特殊的环境造就的独特的生存形态和思维又如何能理解呢？这注定他无法在人类文化领域中取得研究成果，而只能在自然科学范畴里有所收获。因此，称他为博物学家似有些夸大其辞。

19世纪后半叶，是又一个地理发现时期，欧洲各国对世界各大洲的广阔地带都进行了考察，俄国更将目光投向亚洲，就其考察的目的而言，学术上带有为帝俄殖民政策服务的动因，政治上带有

殖民扩张、奴役中国人民的性质。普氏是众多进入中国的俄国考察者中最引人注目的一位，这是因为首先他具有多重身份：既是旧沙俄时代的一名军人，又是在国际上确立了探险地位的探险家，还是一名科学工作者；其次，他在亚洲考察的地域辽阔、观测资料和搜集品丰富，并能迅速将探险成果写成巨著介绍给社会；其三，他在中国的土地上发现了在欧洲早已绝迹的野马，这一点引起了整个学术界的轰动；最后，在有关罗布泊位置的问题上，由他掀起了一个世纪之争，并推动了罗布泊的地学研究。

普氏终身未娶。在他功成名就，亲友们劝他结束单身生活时，他坚决地拒绝说：“我要重新奔向荒漠，在那里，有绝对的自由和我热爱的事业，在那里比结婚住在华丽的厅堂里还要幸福百倍。”

普氏暴病死于第五次亚洲中部考察的出发点——离伊塞克湖不远的卡拉科尔城，享年 49 岁。弥留之际，他向旅伴们交待着：“一定要把我埋在伊塞克湖的岸边……一定要给我穿上我在考察时穿的衣服……”按他的遗愿，他的遗体永远留在了亚洲。为纪念他，他逝去的那座小城被更名为普尔热瓦尔斯克，这一年是 1888 年。